

一 留学生东瀛试锋芒

1. 浮槎东渡起雄心

东亚风云大际沉，浮槎东渡起雄心。
为求富国强兵策，强忍抛妻别子情。

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当年所写的这首诗，生动地反映了 20 世纪初前后，中国有志青年为探求富国强兵之路，挽救祖国危亡而东渡日本求学的壮志雄心。

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，使清朝统治者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。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为了“师夷长技”，遂发起了洋务运动。他们除了兴办近代军事工业、民用工业以外，还创办了一些洋式学堂，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和近代自然科学技术。此外，他们还建议清政府选派留学生直接到外国学习。1872 年，曾

国藩、李鸿章向清政府递送了《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》奏折，得到批准。

但由于各种原因，在此后的近 30 年间，仅有 200 多人被选送到美、英、法等国留学。这 200 多留学生，连洋务派官僚都感到“不足使用”。

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形成热潮，是 20 世纪初年的事情。留学的国度也由以欧美为主转向以日本为主。一时间，“留日”成为许多知识青年追求的目标。据统计，1901 年中国留日学生仅为 280 人，1903 年猛增至 1300 多人，到 1906 年已有 8000 人之多。当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曾生动地描述了这股留日盛况：

学子互相约集，一声“向右转”，齐步辞别国内学堂，买舟东去，不远千里，北自天津，南自上海，如潮涌来。每遇赴日便船，必先机抢搭，船船满座，务求早日抵达东京，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。

不仅东南沿海的学子们“航东负笈，络绎不绝”，四川、贵州、云南等边远省份，也有许多人负笈东渡，到日本留学。有人回忆说，

当时中国学生游学日本者，“其多如鲫”，“相望于道”。此种盛况，为“任何留学国所未有”。

这个时期之所以出现如此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，除了路途近、费用省、文字相近等原因外，更主要的是广大中国知识青年有着向日本学习，以挽救民族危亡、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。

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，中国正处在一个苦难和动乱的年代。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屡次得逞及随之而来的瓜分中国的狂潮，使中国人民深受刺激，尤其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反思和觉醒。他们认为，为什么一个蕞尔小国的日本能打败泱泱大国的中国呢？主要是因为日本经过 20 多年的维新，学习西方卓有成效，所以很快崛起，成为亚洲的强国。因此很多青年都向往到日本留学，直接了解日本改革的经验，以便效法日本，为自己的祖国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新路。正如时人所说：“日本学习欧美，故其强同于欧美。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，则其强亦必如日本然。庚子以后，各有留学于东京者骤增数倍，其不本此意为宗旨者，恐百无一人也。”

吴玉章在东渡日本途中曾赋诗说：“莫谓

东方皆落后，亚洲崛起有黄人。”这种对日本崛起的由衷钦叹，反映了当时许多中国青年的共同心态。后来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过：“要救国，只有维新，只有学外国。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，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。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，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。”

2. 留日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

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，以极大的求知欲发愤读书，广求新知。他们不但努力学习近代科学知识，而且力求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。

通过接触新知识新思想，了解日本社会，使留学生的眼界大开，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滋长。

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所受到的歧视和冷遇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感情。

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，一些日本人轻蔑中国人的观念愈加严重。一些日本学生认为中国是弱国，“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，分数在 60 分以上，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”。甚至一些房东、店员、车夫也时常嘲弄中国学

生，连一些日本小孩也敢辱骂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留学生是“豚尾奴”（拖着猪尾巴的下等人）。中国留学生在生活中所受到的各种冷遇，实已处于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的境况中。日本的民族歧视，使他们“怆民族之不保，痛神州之陆沉”，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，在异国他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爱国斗争热潮。

1902年4月，章太炎、秦力山、冯自由等发起组织了“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”。章太炎起草的《大会宣言书》，以慷慨激昂的词句号召进行革命排满斗争。

会议原定4月26日在东京上野公园召开，报名参加的留日学生达数百人。但由于清朝驻日公使的破坏，会议没能按期举行。

4月27日，在孙中山提议下，会议转移到横滨永乐楼。大会宣言广为散发，并登载在香港《中国日报》上，在日本、香港、澳门等地造成很大影响。爱国志士和留学生闻之无不感奋。

通过这一事件，一些思想激进的留学生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联系更为密切了。

同年七八月间，又发生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。

当时，中国自费留学生钮璠等 9 人，准备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。但按校方规定，中国自费学生需有清朝驻日公使的保证才准入学。而清朝公使蔡钧却以“防范革命排满”为辞，拒绝在 9 名学生的入学证件上盖章。留学生集体闯入公使馆诘问，蔡钧不仅拒不接见，而且还报请日本警方将为首学生吴稚晖、孙揆均拘捕。

消息传开，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，纷纷举行集会，声讨蔡钧“辱士辱国”。《新民丛报》等报刊也揭露蔡钧等勾结日本当局迫害学生的罪行。

在学生的坚决斗争和舆论的压力下，清政府被迫派出专使赴日安抚学生，钮璠等 9 名学生也于翌年 1 月获得保证，正式进入成城学校。这场直接针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结束。

在斗争中，留日学生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，于是在当年冬，以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为主，发起成立了青年会。该会会章明确揭示：“以民族主义为宗旨，以破坏主义为目的”，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。接着，留学生各省同乡会也纷纷成立。

青年会等组织的出现，为留学生运动的高

涨在组织上准备了条件。

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加和组织的加强，留日学生运动开始走向高潮，其中影响最大的有 1903 年的拒俄风潮和 1905 年的反对《留学生取缔规则》运动。

1900 年，沙俄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，派十几万军队侵占了中国东北的主要地区。俄军烧杀淫掠，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。

1902 年 4 月，沙俄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中俄《东三省交收条约》，规定俄军在 18 个月内撤完。但到翌年春，沙俄不仅拒绝按约撤军，而且向清政府提出独霸中国东北的七项无理要求。

消息传到东京，立即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。4 月 29 日，500 多名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集会，声讨沙俄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。会上群情激昂，一致议决成立“拒俄义勇队”，赴东北前线拒敌；另设本部，在后方筹措军事。两天内，就有黄兴等 130 多人签名参加义勇队，陈天华等 50 多人参加本部，各省留学生也纷纷召开同乡会，讨论拒俄问题。

留学生们表示拼死保卫祖国，涌现出许多慷慨悲壮的动人事迹。

年仅 14 岁的福建学生方声煊，得知沙俄

强占东北的消息后，义愤填膺，坚决要求参加义勇队。同学们以其年幼加以劝阻，方声煊流着热泪说：“我为祖国而死，死得其所。”遂奋起签名，在座者无不为之动容流涕。

浙江学生潘国焘，年龄也仅 17 岁，又瘦又矮，也一定要报名参加义勇队。许多同学劝他改到本部担任国内工作。潘国焘大哭道：“国亡无日，欲求死所且不可得。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，其为吾乡人荣，不更大乎！”

留日女学生也不甘落后，纷纷要求报名从军。日本帝国妇人协会会长试图阻止，女学生们哭着说：“吾辈且无国，安得有身，更安得有学？”遂决议从军北征，担任军中看护等工作。

5 月 2 日，留日学生又召开大会，决定把“拒俄义勇队”改为“学生军”，并制定了规约和军纪，请士官学校学生蓝天蔚为队长，教练军事，随时准备效命疆场，杀俄国鬼子。

清政府驻日官员对留学生的拒俄活动极为恐慌，指摘其“名为拒俄，实为革命”，并勾结日本当局下令解散学生军。

严酷的现实使留学生逐步认清了清政府海外虐民的真面目，促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，发出了“革命岂可免乎？”

的呼号。他们把学生军改称为“军国民教育会”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，革命排满的斗争意识进一步加强。正如参加过拒俄运动的吴玉章回忆说：“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，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波澜，把我推入革命的洪流”，“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”。

与此同时，国内上海、北京、武昌、江西等地的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也纷纷集会，谴责沙俄的侵略罪行，斥责清政府“内失国权，外招大衅”的卖国外交。一些学生还效法留日学生组织了“抗俄铁血会”、“东北义勇队”等组织，准备赴东北参加武装抗俄斗争。

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运动的开展，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忍受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，显示了中国先进青年的新觉醒。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这场斗争的洗礼，在政治思想上有了一个新的飞跃，开始由一般的爱国救亡、要求改良而转向反清革命。

拒俄运动结束一年多后，中国留日学生又掀起一场反对《取缔规则》的大风潮。

1905年11月，日本文部省颁布了《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》（留学生简称其为《取缔规则》）。该规则表面上是为

加强对招收中国留日学生的日本学校的监督管理，实际上包含接受清政府的要求取缔留日学生活动的意图。由于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清革命倾向越来越鲜明，已成为反清革命的主要力量，清政府因此要求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严加管束，以扼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。

日本当局颁布的这项规则，其中有些条款可作为拒收和惩罚有革命行为的学生的借口，因此规则一公布，立即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一片抗议声。他们“既深恶祖国专制”，又痛恨“异国专制压迫”。

12月4日晚，各校留学生代表赴公使馆请愿，未获结果。第二天，东京中国留学生300多人集会，抗议日本当局的无理举措。会议发表了《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之驳议》的声明，从法理的角度逐条驳斥了取缔规则。会议一致议决各校留学生集体罢课。

12月6日，东京各校留学生一齐罢课。随后，在京都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相继罢课。反对《取缔规则》运动迅速发展为全体留日学生运动，参加罢课斗争的中国留学生达8000人以上。

在中国留学生的坚决斗争和舆论的压力下，日本政府被迫让步，宣布暂缓执行这一规

则。各校当局也劝说中国留学生返校复课，清政府也派出特使到日本调停，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于翌年 1 月中旬相继复课。

反对《取缔规则》运动是中国留日学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日斗争。通过这一斗争的锻炼，使许多留学生放弃了对日本的幻想，对日本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本质逐步有所认识，增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，从而为以后的反日斗争埋下种子。

吴玉章后来回忆说，经过反对（取缔规则）的斗争，“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随着它对中国侵略的加强而与日俱增。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，在我以后的生活史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”。

一些日本学者也认为，通过这次斗争，许多中国留学生对逐渐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“提高了警戒，并试图与之对抗。而且也果敢地同急于勾结日本帝国主义、以图自保的西太后政府决战。这是留日学生反帝反封建的萌芽”。

二 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

1. 《革命军》的号角

革命，总要先造成舆论。每一场革命的爆发莫不以舆论为先导。中国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——辛亥革命，也是如此。

中国近代学生群中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最早，反封建意识最强的一部分——留学生，在革命宣传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。

在制造革命舆论方面，仍以留日学生的宣传效果最为卓著。

20 世纪初年以后，留日学生所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。1901 年，在孙中山的资助下，留日学生秦力山在东京创办（国民报）月刊，“大倡革命仇满之说，措辞激烈，

开留学革命新闻之先河”。此后，各省留日学生相继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。如湖南留学生杨笃生、黄兴创办的《游学译编》，湖北留学生李书城等创办的《湖北学生界》，直隶（河北）留学生杜羲等创办的《直说》，云南留学生李根源等创办的《云南》，浙江留学生孙翼中等创办的《浙江潮》等等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从 1901 年到 1911 年，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所创办的刊物，达七八十种之多。

这些刊物所宣传的思想虽然还比较复杂，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就是从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出发，报道和分析世界大势，指陈清政府的反动腐朽和祖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，呼吁有志青年奋起抗争，担当起挽救祖国危亡的重任。

当时许多刊物都以大量篇幅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，报道留学生和国内群众开展的反帝爱国斗争，号召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“以死抗之”。许多刊物还把斗争矛头直指腐朽卖国的清政府，指出清政府已成为“外人之傀儡”，中国国民应该“与满清政府宣战”，推翻封建君主专制，建立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。这些刊物思想激进，观点鲜明，笔锋犀

利，深受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，对促进中国青年的觉醒起了很大作用。

随着留日学生运动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，涌现出一批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宣传家，邹容、陈天华等是其中杰出的代表。

邹容，字威丹，四川巴县人。1902年春，就学于日本同文书院。留学期间，他通过广泛涉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，又亲眼目睹清政府的腐败，民主革命意识不断增长。他积极参加留学生的爱国运动，并以经常发表言辞犀利悲壮的演说而崭露头角。

1903年4月，邹容因痛殴清政府驻日学生监督姚文甫而被迫回国。回国后，他在积极参加拒俄运动的同时，以奔放豪迈的激情挥笔写就《革命军》一书。该书篇末以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自署，表示愿为革命事业甘当一名奋勇进击的勇敢战士。著名革命思想家章太炎为之作序，称该书是震撼社会的“雷霆之声”。

《革命军》以激越昂扬的爱国热情和痛快淋漓的文字，无情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罪恶，热情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，论证了反清革命的必要性。邹容在书中指出：革命是“天演之公例”，“世界之公理”，是“顺乎天而应乎人”

的伟大举动。中国人民要摆脱清朝的统治，争取民族独立，则“不可不革命”。他号召人民起来，效法英、法、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，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，扫荡干涉中国主权的“外来之恶魔”，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“中华共和国”。

（革命军）的嘹亮号角很快响遍神州大地，深深打动了无数爱国者，成为激励他们走向革命的“教科书”。正如吴玉章所说：“号角一声惊睡梦，英雄四起挽沉沦。”

陈天华，字星台，号思黄，湖南新化人。1904年初，他写成了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两本有巨大影响的小册子。在这两本书中，他以激昂的爱国热情，采用通俗的说唱文学形式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“拱手降洋”的卖国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。他在《猛回头》中写道：

俄罗斯，自北方，包我三面；
英吉利，假通商，毒计中藏；
法兰西，占广州，窥伺黔桂；
德意志，胶州领，窥视东方；
新日本，取台湾，再图福建；
美利坚，也想要，割土分疆。

面对此危厄形势，清政府抱何态度呢？该书揭露说：

这朝廷，原是个，名存实亡，
替洋人，做一个，守土官长，
压制我，众汉人，拱手降洋。

陈天华痛感只有唤起民族的觉醒，才能“救我中国”，因此他大声疾呼：“醒来！醒来！快快醒来！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。”祖国的同胞们，一定要发扬爱国的心，勇任救国的事，“万众向前，杀那投洋鬼子的二毛子”。“改条约，复政权，完全独立”，“雪仇耻，驱外族，复我冠裳”。

《警世钟》、《猛回头》出版后，也很快在群众中流行开来，出现了“稍识字者，即朗诵之”的动人场面。《革命军》、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的风行于世，大大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和人民群众的觉醒，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革命洪流中。

2. 革命团体的中坚

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派队

伍的日益扩大，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。1904年，各种革命团体在国内纷纷建立。这些团体虽然具有不同的特点，但都力图适应局势的发展，担当起领导革命的重任，其中以华兴会、科学补习所、光复会最有影响。

华兴会是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。1903年初夏，黄兴回家乡进行反清革命运动，一面做革命宣传，一面密邀志同道合的同志筹划组织革命团体。这年11月4日，刘揆一、陈天华等12人在长沙以给黄兴祝寿为名秘密集会，一致议决成立华兴会。他们提出“同心扑满，当面算清”的口号，隐寓“扑灭满清”的意思。翌年2月15日，在长沙明德学堂校董寓所正式召开成立大会，到会者有100多人，推举黄兴任会长，宋教仁、刘揆一任副会长。

华兴会的组织者多为留学生或在国内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，如黄兴、宋教仁、刘揆一、刘道一、吴禄贞、李书城、杨笃生、张继、田桐、孙武等。他们是华兴会及后来同盟会的骨干分子。

科学补习所是湖北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，1904年7月初在武昌成立，以吕大森为所长，胡瑛为总干事，以“革命排满”为宗旨。其成